

【全球化问题研究】

全球化时代的移民对东亚的影响

李路曲,李培广

(山西大学 政治学系,山西 太原 030006)

关键词: 东亚;移民;文化;全球化

摘要: 在东亚,民族与国家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全球交往加深以来,这些社会所深深认同的在国家范围内民族单一性的观念受到了国际移民的挑战。这些移民多数是来自亚洲或者是有着亚洲种族血统的拉美人。多元民族社会的出现已经开始了,由全球化而引发的移民和较高收入社会的人口下降对近来及未来数十年的公共政策会有很大的影响。尽管各国的中央政府继续推行使单一民族国家现实化的政策,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和市民组织已经在很多情况下对种族和文化的多样性现实以及外国工人在他们的社区的生活、工作及社会公平问题做出越来越积极的回应。这必然对东亚的社会结构及民主的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图分类号: D73/77/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35(2002)05-0032-05

一 移民潮与社会结构的变迁

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结合或者说日益增加的跨国公司、商品链及金融市场的空间网络形成的过程,而且也是不断增加的大量的人口跨越国界的社会流动过程。这一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明显地加快了,到90年代中期已经有125 000 000人生活在他们的出生国或公民权以外的国家,而且这个数字每年以2~4百万人的速度增长。^[1]即使是在处于经济不景气时期的东亚国家,每年从国外来寻找工作的人也在攀升。^[2]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东南亚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的低收入移民开始被征募到高收入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来自临近地区和南亚的10万人涌进了菲律宾,数百万人涌进了马来西亚,他们都是低收入社会的农民或市镇的工人。

与移居世界其他地区的移民有所不同,那些移

民有很多是因为婚姻、战争和自然灾害,而到东亚的移民主要是这样一种形式:廉价劳动力和家政劳动,例如从菲律宾流到高收入地区的女佣。这是由于迅速的经济和收入的增长在这些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建筑、装配和小型制造等被称为3D(dirty, dangerous, difficult)行业中出现了长期的劳务短缺的情况。当地人不愿从事这些职业,低收入国家的移民则愿意填补这些空缺。这种移民方式被称为“现代社会移民的典型”。^[3](第20页)

过去在国际范围内的民族、种族和文化的多样性现在已经折射到东亚高收入国家的内部直至地方社区。与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代的早期东亚的少数民族通常只局限于一个或很少几个种族(例如海外的华人、南亚的泰米尔人和日本的朝鲜人和台湾人)不同,新的移民的来源更为广泛,甚至来自于亚洲之外。台湾的外国劳工约在20~30万之间。其中有4万人是来自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收稿日期:2002-08-09

作者简介:李路曲(1959-),山东德州人,山西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候选人,从事国际政治研究;

李培广(1969-),山西朔州人,山西大学政治学系2000级研究生。

亚,他们在退休的家庭中做家务工作。台湾已经对廉价的外国劳工非常依赖,1999年台湾当局宣布它将正式允许小企业公开从海外招募工人。^[4]在新加坡,外国劳工相当于其国内总劳动力的19%,这当然包括每天从马来西亚来定时做工的工人。在日本,众所周知,电子机械、塑料、化工企业、建筑和汽车部件生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低工资的外国工人了,即使是在经济不景气时期也是如此。1994年一年在亚洲就有50多万人从低收入国家流动到高收入国家和地区,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各自分别接收了30~150万人。实际流动的数量要比这个数字多得多。

官方统计的数字大大低于实际的移民数量。以韩国为例,政府估计在1998年中期有123 000未注册的外国劳工。仅在政府宣布不对于1998年12月至1999年3月之间离境的非法移民进行惩罚这一段时间里,就有47 000非法移民离境。在日本,签证过期的人,其中大多数可以被认为是非法劳工,按照官方的统计每年已超过30万人。其他方面,仅仅酒吧女招待一个行业,至少就有超过30万人的非法打工者。^[5]在日本的外国劳工中妇女占到一半。此外,在日本这样一个或者说任何一个较富裕的每年有300万人持旅游签证进入的国家中,正在打工的人是说不清的。因此,尽管官方公布有1 400 000注册的外国人在日本,一些证据表明可能有4 000 000人正在试图或已经在日本工作。在马来西亚,大量的印度尼西亚人涌入到马来西亚的农村去做农业工人,人数估计在1~2百万人之间。

在一些移民的来源社会和接收社会之间,不仅正在形成日益密切的移民网络,而且还在逐渐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现实,它超越了移民来源地和接收地各自地方的、民族国家的甚至区域的文化联系和社会联系。与此同时,某些重要的社会风俗也正在经历着一个变化过程。这一变化过程所具有的意义和功能,无论是按照移民来源地还是按照移民接收地的标准来衡量,都是难以理解的。因此,有的学者指出,不能仅仅是“分别孤立地去研究移民来源地或移居住地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条件而是对‘移民系统’内部的社会网络和‘移民链’进行研究。”^[3](第235页)或许更为深刻的挑战是向单一民族支配国家的传统观念和事实:传统上,在民族国家形成的基本事实的基础上,人们总是把某一民族与某一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例如认为日本是大和民族的国家,韩国和朝鲜是高丽民族的国家,马来西亚是马来族

的国家,印尼是爪哇人的国家等。这与300年来的历史是一致的,但现在正面临着多元化社会日益发展的挑战。

二 移民和非政府组织争取平等的运动与政府政策的改变

随着东亚各国摆脱权威主义的统治和向民主政治的转变,继续实行漠视移民的基本人权的政策变得日益不得人心了,而且也越来越受到外国移民甚至本国公民的反对。尽管东亚各国的中央政府仍然能采取非移民化的政策,但许多地方政府和社区已经开始在他们的辖区内采取积极的政策来改变移民的状况了。

在日本,较为普遍也比较好做的是一些地方的政府允许在公共场所使用多种语言,而且为了移民的方便地方政府在报道当地事务时除使用日语外还同时使用其他语言。个别的地方像Kawasaki市,长期以来它是朝鲜人的聚居地,近年来拉美的Nikkeijn人和菲律宾人也定居在这里,市政府与朝鲜社区共同制定了反对歧视外国移民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更为直接地向外国移民开放社会和公共服务设施,建立一个少数民族文化社区中心。在Kanagawa区附近,建立了一个完全由移民组成的委员会,目的是向地方政府反映移民对公共政策的看法。Osaka市政府已经提出应该允许家族小企业与受过训练的外国人签订合同,让他们担任熟练工人的工作。这一动议是对中央政府政策的挑战。该市最近还决定允许长期定居者有资格被公共机关聘用,而在过去,未取得公民资格的人是不能被任何企业聘用的。

地方政府之所以越来越关注和支持当地移民的利益,主要是由于在地方层面上,外国移民经常因为要求改变不平等的生存条件或政治条件向政府请愿或抗议。以日本为例,合法和非法的入境者在地方社区中停留的时间正在增加,这一事实使他们的要求经常化和持久化。在合法和非法移民中的这些趋势正迫使地方政府采取措施改善移民的居住条件,提供医疗服务和其他福利保障,并为工人及其后代提供教育。“在这些地方,受新移民影响的地方政府正在填补着由于中央政府”不愿为在日本的移民做更多的事而留下的空白。地方政府采取的这一系列的地方政策措施,包括如何防止在外国移民和日本人之间的摩擦,如何使非公民享受到日本人享有的福利等,对于他们融入日本社会及提高对这一问题

的认识有很大的促进。地方政府当然希望公民与非公民之间进行合作,希望它们制定的有关外国移民的政策能够引导人们建立一种新型的‘与外国人共存的社区’。一些地方政府已经进一步向着绕过中央政府为非日本人取得日本社会成员地位设置的障碍的方向努力,它们实际上正把外国移民当做‘地方公民’。地方政府的政策构成了一种潜在的迹象,使人们重新考虑过去在人们的观念中占支配地位的关于民族国家的认同问题。”

然而,东亚各国甚至一国内部各地方政府对移民问题的回应是不同的,并且趋势是按照国际移民的不平衡的分布而做出不同的回应。移民人口较多的地方的政府受到的压力相对较大,因而可能较早地为改善移民环境制定出政策和计划;并且,国内的政治制度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与日本的情况有所不同,在东亚其他的移民国家和地区,大多数的情况是,由选举产生的地方责任政府或者不存在,或者很弱。各国还没有出现像日本那样有较大作为的地方政府,它们没有能力或者没有那样的宪法地位来采取行动。

支持移民的非政府组织的努力似乎更加积极,这类组织已经在地方层面上出现了。宗教组织通常走在支持移民争取权利的前列。这类非政府组织也像其他的非政府组织一样正伴随着政治自由和市民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与国家私人机构并列构成了第三种社会利益组织。

在日本,据1997年的统计有145个支持移民争取人权的非政府组织。在东京,有一个叫Zentoitsu的劳工组织吸收了570名外国工人。另一个由日本妇女基督教禁欲组织建立的名为“爱与和平非常家园”的组织(HELP),为外国移民妇女建立了紧急家园,在被救的妇女中有很多都是在陷入卖淫业的。这个组织在1986年~1997年间为2000名妇女提供了庇护和服务。东京市政府也资助了该组织的活动。在韩国,在1997年后期经济危机来临后,非政府组织发动了一系列的运动为移民工人提供合法的保护。主要目标之一就是防止他们被大量的解雇,当时移民工人的大量失业导致了他们无依无靠,甚至没有回家的费用。此外,当时很多企业都采取一种非法的但非常广泛的手段,它们解雇长期的合同工人尤其是外国工人,然后通过就业部门按照临时工来重新雇佣这些被解雇的工人,只给他们发相当于原来60%的工资。在1997年临时工的数量由335000人骤然上升到4200000人,日工的数量由

93000人上升到1890000人,而长期工的数量则由7133000人下降到244000人。非政府组织反对企业的这种非人道的行为。当地公民与外国工人当时共同组建了一个名为“移民工人联合委员会”的不受政府控制的工会组织,极力要求政府取消它的“工业技术训练计划”。按照当地的法律规定,只有接受这个计划提供的培训,才能获得工作,因此这是移民取得合法工作的惟一渠道。但它并不像计划中承诺的那样提供技术训练,而只提供那些进行长时间工作而工资很低的廉价劳动的培训。移民工人联合委员会建议政府实行同工同酬政策,实行像国际人权宪章那样的种族平等政策。

除了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外,东亚少数国家的中央政府的某些部门在日本事务上和政策上也采取了一些支持外籍工人的行动。尤其是随着民主化的推进,中央政府的有关部门被迫制定出一些使外籍工人获得像本国公民一样的工作权利的法规,这就构成了向其他一些未采取这种举措的部门的合法性的挑战。结果是,当中政府的某些部门致力于控制边界,根据国家经济的状况而造就一种吸入或逐出移民的拉锯局面时,其他的政府部门和许多地方政府则迫于它们的统治过程中的压力,根据移民的现状,考虑移民的困境,进行了支持移民的政府改革。

三 文化、社会结构的变化与民主化

随着国际移民劳工的大量增加,边界变得更容易穿越,关闭边界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通过控制移民来调节本国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了。在东亚,边界的被冲垮是由于想要成为移民的那种坚持不懈的动力和冲击力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具体来说,就是从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移居都有着适宜的发生环境:在民族国家之间扩大的收入差距构成了移民的基本动力;高收入国家人口的急剧减少以及长期缺乏非熟练和低收入工人也是一个重要动因;由于全球的通讯和交通运输的革命性进步而装备起来的职业征募者、移民贩子以及政府使移民的管道更为制度化,这无疑也加速了移民的流动;最后,在移民接收国的以改善移居者生活环境为宗旨的组织和运动的兴起不但在狭义上推动着移民运动的发展,而且还在广义上发展了移民运动,即改变着移民的生存环境和接收社会的制度。

世界到处都发生着种族、民族、阶级和种性间的冲突,这种斗争深深地打着地理空间的烙印,并不断

改变着当地社会的结构。在东亚,最明显和最多的情况是以国际劳工移民的形式对国界和民族国家的冲击。尽管那些政府、企业和社区试图通过对边界的选择来控制那些来自于国外的廉价劳动力,但是移民工人并不仅仅是只想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和赚钱,而且要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享有一个人所应享有的其他权利,想要得到爱,要组织家庭和生儿育女,还要进行文化和宗教活动,生活的与其他人一样。进而还要争取政治权利。

有证据表明,在本地公民和移民之间的互相评价正在不断地提高,交往也在增加,各种族之间的较为密切的社区交际活动日趋频繁。移民不仅对移民社会产生着政治影响,而且对输出地也产生着政治影响。劳动移民不再仅仅被视为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安全阀,而是越来越被视为本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中重要的资金和人才资源。由于移民社团有着重要的经济地位,所以输出社会越来越重视他们的政治态度,而移民往往也不断对祖国的政策提出批评。

向东亚移民的过程与 20 世纪 50 和 60 年代向欧洲的移民是不同的,当时有数百万客居工人(guest workers)被带到欧洲的工厂中。自那时以来,世界经济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一种新的国际化的劳动分布和资本的跨国化已经消除了促使低工资国家的劳动力流向发达国家的装配线的压力。现在发达国家征召移民劳工主要是用于非出口性的服务业、建筑业和内向型的生产行业。装配线工作由近海向低收入经济区的转移将最大限度地确保移民劳动局限于内向型生产。这样一来,使移民更为紧密地与当地城市和社区的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这样一来,像过去那样对他们视而不见、漠不关心就更为不可能了。

在 21 世纪最初几十年中,东亚各国的社会结构将由于人口的变化、区域内和区域外的移民而发生较大的变化。高收入社会将接受更多的国际移民,外国血统人口的稳定增长将日益挑战过去那种把单一民族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主导观念。那些在许多国家长年旅居的“跨国的”移民将变得越来越多,处理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经常性的问题,并向在特定的时期一个人只能有一国公民地位的传统观念和体制的挑战。

当然,移民所产生的政治和社会关系也有着向相反方面发展的趋势。一些国家的移民机构和社会沙文主义运动相结合,尤其是在 20 世纪末的经济危机期间,明显地表现出对文化纯净主义和排外情绪

的崇奉。其表现在政府的政策方面是,在使用外国劳工问题上限制的更为严格,更为严格地限制移民;在社会领域中是不断发生种族摩擦,甚至暴力冲突。这在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实际上,在东亚的移民社会中,两种相互矛盾的观念和社会行为正在发生着碰撞并交织在一起,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政府的政策。一方面,尽管存在着不断增加的移民趋势以及肯定会来临的多元文化的时代,移民接收社会的很多人仍然不愿接受这样的现实,在他们看来,这个国家或社会仍然是他们一个民族的,只要他们愿意,仍然可以按照本民族的意志阻止移民的到来,而且也应该这样做。外国移民持续地涌入在一个多少年以来一直是单一民族与国家相吻合的、并已深深地持有这种信念的社会中引起了许多人心灵的震动,如果这个国家不再是一个民族的,那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其现实中的表现也很明显,一般来说,哪里的移民多,哪里就有夸大种族主义、恐外症和种族优越论的趋势。另一方面,在现实中继续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把移居者排斥在公民社会之外是要冒很大风险的。移民中日益增长的对社会公平和安全的基本的人权要求,已经强有力地反映到政治领域中来了,并且可能会带来一种潜在的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

移民是否能够被以一种平等的方式接纳,是否可以得到表达自己文化和宗教认同的社会空间,或者是使这些外来者一直处于边缘状态,处于被剥夺权利的和活动空间狭小的非公民状态,是可以任意支配的工人,这些问题将成为地方的、国家的和国际政治辩论的一个中心问题。以承认外国移民的人权的方式来解决这些争论的关键问题是把公民身份与民族或种族分离开来,通过承认社会的文化多元化来超越传统式的民族国家及其以同化来取得公民地位的方式。一些调查发现,日本的某些地方社会对于多元文化、种族、民族及“共同享有公民地位”的思想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认同了。人们已经认识到,在这方面,社会发展目标已经不再是建立一个种族之间“彼此隔离和平等的”社会,这只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而是要建立一个可以自由选择文化认同的社会。这种选择的宗旨是并不把认同传统的大和民族,例如并不把移居日本的朝鲜人融入大和民族作为主要目的。开放地接受外来移民并使其在当地社会与本地公民平等的共生将被证明是一种可能的国家认同的形式,这种选择为正在出现的多元文

化社会找到了出路。

种族或民族与国家认同相分离的挑战是面向所有社会的,并不仅仅是东亚各国。全球各地的发达和新兴工业化的开放社会几乎都不得不与多种族或多民族人口的变化和交融达成妥协,但是由于东亚这些很长一个时期一直是较封闭的社会正面临着历史上最大的、来自于全球的移民的压力,以及受此影响的社会变迁过程,因而备受关注。无论如何,继续单纯地利用对边界的管理来处理现实的外国劳工问题,将会推迟而不是消除解决国际移民造成的基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的要求。

市民社会的觉醒和国家的民主化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并不一定能挑战过去那种单一民族绝对支配国家的模式,并不一定会使移民受到更为平等的待遇。这个世界对于这种轻率的、过于乐观的结论有太多的相反的故事。东亚的一些社会随着权威主义体制的解体而沿着种族和民族的分界线发生了分裂,例如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有的国家则存在着分裂的隐患。在世界的其他一些地方,当社会按照纯洁民族和种族的理论并使用暴力重新构造自己的时候,“种族清洗”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后共产主义的一种政治统治方式。展望未来,这些多样性的情况预示着国际移民的社会后果仍将依现实世界的关于民族或种族与国家的一致性和非一致性斗争的后果,在不同的地区将会有不同的表现。然而,在发达

的民主国家,尤其是在那些文化比较多元化的发达的民主国家,移民社会的成熟显然有利于民主的发展,也会挑战单一民族与支配国家的观念,例如在美国和加拿大。我们还应看到,从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来看,即使是在全球化的形势下,人类各社会的发展也不太可能走一条一种文化同化另一种文化的道路,而是走一条自由选择文化认同并相互融合的道路。与此同时,民主的高度发展也必然会促进移民社会的成熟。而当前沿种族分界线发生的分裂还是民主社会不成熟的表现。

参考文献:

- [1] Allan Findlay, Huw Jones, Gilian Daidson. Migration Transition or Migration Transformation in the Asian Dragon Economi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98(4): 643-653.
- [2] Battistella Graziano, Maruja M. b. Asis. The Crisis and Migration in Asia [M]. Quezon City: Scalabrini Migration Center, 1999.
- [3] 乌·贝克, 哈贝马斯. 全球化与政治 [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 [4] Workers Needed for Elderly [N]. China News, 1999 - 2 - 11 (1).
- [5] Sakamaki Sachico. Stateless Children: Offspring of Illegal Aliens in Japan Face Legal Limbo [J].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994, (2): 38.

The Migration Influence on the East Asian Society in the Globalization Era

LI Lu - qu, LI Pei - guang

(Department of Politics,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Key words: migration; East Asia; culture; globalization

Abstract: People often associate nation with country in East Asia. But from the 1980s, the firmly rooted idea that a single nation must be within one country is challenged by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Most of these migrations come from Asia or Latin America of Asian extraction. Multiply nation society has come into being. The migrants caused by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pulation descents in a high - income society have great influences on the public policy recently and in the near future. Although each central government continues to have its single nation policy,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civil organization do some reactions on the various nations fact and its life and equality. All this must give rise to great influence on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process of its democratization.

(责任编辑 魏晓虹)